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华文明底蕴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牛喜平

(国际儒学联合会, 北京 100000)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系统辩证的科学方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着眼于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实际的结合与创新;为世界构建和平发展之道、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明了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其深刻的哲学理论基础;“生生不息”的生存发展观,肯定天道与人生命的创造力,主张参赞化育的社会实践精神,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态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天下大同”的人文情怀和政治理想,“正德、利用、厚生”的治国、经世原则,“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协和万邦”的天下大同理想可为文明秩序重塑提供有益启示;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明互鉴观,既可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黄金法则,也是各国人民和睦相处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世界问题导向为出发点,兼顾了不同国家、民族、人民的整体利益,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成为跨文明的“相聚点”。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明 国际关系 文明交流互鉴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6-00016-09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于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深邃的中华文明底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安全危机、环境危机”^{[1](P27)}。如何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课题。面对危机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

复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牢固树立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克服困难,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出的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解决方案。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在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中都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共识,需要结合当代世界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加以挖掘、融合、继承、弘扬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并非偶然,它植根

收稿日期: 2023-10-25

作者简介: 牛喜平,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研究。

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华文明土壤,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是其思想渊源。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文明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国家、族群的褊狭,站在全人类的视角,树立了一种整体文明观,引导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充满变乱交织、风险和挑战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具有包容性、普遍性、和平性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经由理念构想、到解决方案、再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系统辩证的科学方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实际的结合与创新,彰显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底蕴。

第一,以道观天下,为世界构建和平发展之道。连续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思想文化,在继承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诸子百家的争鸣,在秦以后形成了以“儒道互补”为主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及后来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传统构成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持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策,影响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在这些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历来都有从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立论,以道观天下,建立学说,指导人生,影响社会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2](P62)}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比作行天下之大道,正是对“以道观天下”的传承发展。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他洞察世界历史变化的规律,努力探索人类建设现代文明新道路,推

动构建世界永久和平发展之道。“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可解释为人类前进的路径。中华文明的基本模式就是一种趋“善”之“道”,它在一代代的传承发展中展现开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发展的就是这样一种“善道”:它关照了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全体,追求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价值,兼顾了不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主张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这些思想对未来文明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的变革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第二,独特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变化之枢。中国学者牟钟鉴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概括为辩证法三大系统:一是以《周易》为代表的尚刚主动的儒家辩证法,二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尚柔主静的道家辩证法,三是以《华严宗》为代表的无碍圆融的佛家辩证法。^{[3](P48)}在对待、处理交往双方的分歧、矛盾方面,中华文化以其整体性、动态性的宇宙观,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明的观察、处理、解决分歧的思维方式。如中庸中的“致中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张载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都认为事物从对立到统一,从斗争到和谐,矛盾对立双方都存在着互相转化,阴阳互补的关系,与西方文化中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冲突形成鲜明对照。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修斯底德陷阱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亦与那些动不动用武力征服、用武力威胁的霸权逻辑形成鲜明对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外交思想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中华文明中这种与时俱进、从善如流,内外开阖、上下贯通、执两用中、通变时中的独特思维方式,在处理国际关系、管控分歧、化解冲突中的灵活运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

如何在各类纷争,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求同存异、取精用宏,解决处理矛盾的“道枢”概念和“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思维方式:“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彼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4](P24)}庄子认为,由于人类受到时间、空间和思维的局限,从而导致认识的相对性,使认识真理充满困难。因此,努力超越自身狭隘的认识,破除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的偏见,包容对方的观点,超出是非对立之上,达到更高层次“道”的境界的认识,就是掌握了道的枢要(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掌握了道的枢要,就像进入环中,可以应对无穷的是非(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亦如庄子所述之“道枢”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处理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的魅力和智慧。它从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立论,超越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宗教间的界限,从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交流互鉴观;抓住了解决人类面临各种问题,各种纷争和冲突的“道枢”;为不同文明协力应对困难找到了“道路”。

第三,返本开新,赓续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5]我们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切入,以明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21世纪结出的人类文明之果,代表着人类文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果实之根建基于世界文明整体,主干则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宇宙观和一些具有时空超越性的核心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文化基因,构成其哲学理论基础。这些带有根源性的理念、智慧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

这些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人类所始终关心的,在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重大问题时,它可提供一种哲理式的框架和开放式的原型,亦可为当代人类应对危机,调整和重塑人类文明秩序,为后人诠释、重建学术体系提供基础。^{[6](P23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准确把握“体用贯通”系统辩证的科学方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科学运“用”于全球治理,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特质。进一步探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将有助于我们深入阐释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为全球文明观注入中华文明的强大能量。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对“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华传统理念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促进了世界多元文明相融相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周易》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它记载、蕴含的哲理思想,来自古代中国人长期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观察认识,阐述了宇宙变化的规律,形成了特有的宇宙观。中国人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中国的经、史、子、集中经常用“道”“自然”“阴阳”“和”“五行”“理”“气”“心”等概念形容宇宙自然的整体特性。“天人合一”观是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成为中国人基本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儒家、道家及后来中国化的佛学思想都秉持“天人合一”“梵我合一”的观念,这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史上独树一帜。国学大师钱穆在他的遗作中感悟到:“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

贡献的一种主张。”^{[7](P93)}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了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周易》表述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8](P213)};《庄子》表述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4](P31)};王阳明表述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焉”^{[9](P968)}。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0](P340)}思想则是基于社会实践层面的表达。中国人以整体的、统一的、宏观的、长远的、和谐的眼光来观察、分析看待事物,与西方普遍流行的二元对立,天人对立的认识论形成明显差别。泰戈尔说:“古代希腊的文明是孕育在城市围墙之中,其实,整个西方的文明都以砖瓦泥沙堆砌成的围墙为摇篮。”^{[11](P1)}这很好地说明了中西文化的根源性差异。“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认识与态度,引导中国的政治、文化、学术关注人和世界的整体。中国文化的这种宇宙观蕴含着深厚的宇宙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文明中统一性特征的来源,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第二,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互为依存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是互相依存,对立统一的存在。学者陈来在总结这种特点时写道:“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机械论的宇宙观相比,古典中华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该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12](P3)}。这种万物互系的思想,被现代科学的发展所实证,也被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反复证明,成为中国秉持的“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等

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认为宇宙是一个包容并育的和谐系统。中国人对“和”的追求来自对天道的观察,并将其作为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加以认识。《周易》中的“保合太和,乃利贞”思想,将万物永久的和谐作为天道的自然属性;《中庸》中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阐述了宇宙和谐原理的普遍意义。周代史官史伯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13](P284)}阐释了实现“和”的途径:认为和谐才是事物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原则,同一则不能维持事物的长久,正是个体的不同与差异,各归其位,互相配合,构成了事物整体的存在,事物的多样性是构成整体和谐的基础。“和”在中国文化中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事物的发展在阴阳互动、刚柔相济中共生、共荣、共进,形成整体的和谐。这些观念构成“和而不同”理论的基础与“致中和”的追求,成为中华文明多元、包容、互惠、和谐,具有和平性的基本特征,形成中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总是追求和平共处的思想,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协和万邦”的思想传统。

第四,秉持“天下一家”的世界秩序观。在儒家思想中很早就形成“天下”的观念,将世界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早有“溥天之下”的记载,《周易》有“观乎人文,化成天下”的说法。儒家的天下指的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空间、地理概念,包括自然、人类的总体。《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荀子》中的“四海一家”,《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体现了儒家“天下一家”的世界秩序观,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构成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化解冲突、和睦相处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这种天下观的拓展,它突破了西方文明理念,走了

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全球化道路,是中国德性文化特质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精神的集中体现。

第五,追求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生态观。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下,中华文明中很早就形成了保护环境的理念。中国许多经典都有关于维护生态的观念和带规范性的论述和记载。如《周易》中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表达的是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理念;《孟子》中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表达的是一种有节制地、有度地利用自然的资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表达的是人与自然情同手足的一体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与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思想;考虑到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代际伦理”思想;进而形成“天人互益”,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思想;秉持了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不同的理念。中华文明中蕴含的生态价值观,是当前人类应对全球环境恶化的宝贵资源。

三、“生生不息”的发展观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方法论下,中国人从自然(天道)中领悟到自然创生人类和万物的力量,由此以“道”“仁”“德”等范畴形成了以“生”为根本的“生生”思想。《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8](P410)}“天地之大德曰生”^{[8](P421)},《中庸》中的“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而不贰,其生物而不测。”^{[14](P34)}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儒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涉及到本体论、宇宙论、伦理学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生哲学”,指引人类健康和谐地生存发展。儒家“生生”原理认为,宇宙演化的最高目的意义就是创生万物。由此,把人的生命,包括万物生命的产生、发育(化育)、成长、繁衍,看成是天地(宇宙)中最大的事情。“生生”乃天地之道,天地之德,反映了宇宙变化的规律。一切违背阻碍“生生”的行为都是违背天道,违背宇宙

变化的规律。这种“生生”的生存发展观内涵了以下思想:

第一,肯定了天道和人类生命的创造力。中国哲学家方东美认为:儒家形上学有两大特色,第一便是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第二强调人性的内在价值,通过发扬光大可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此两大特色构成全部儒家思想之骨干。^{[15](P354)}儒家思想中这种创进不息的生命精神,是从对天道自然的实际体验而来。“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人道要遵循天道,即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的规律,实现与宇宙一体同流,共同演化的目的。这种天地之道的创造力,形成中华文明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内核。同时,它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为全人类应对困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注入创进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动力。

第二,建立了由“生”到“仁”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早在周代就实现了由尊神的宗教崇拜向崇尚人间道德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儒家学者以维护人的生存为最高原则,创建形成了由“生”到“仁”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用以指导人类生存发展。这种指引通过实现理想的“仁道政治”和建立理想的“道德人格”两个途径展开,以推动社会进步。由此也形成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奉行王道、反对霸道的民族精神。仁道政治推之到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就是为政以德、亲仁善邻、内圣外王,使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成为全社会普遍原则。《尚书》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思想,孟子提出的“亲亲、仁民、爱物”“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仁义”“仁政”思想成为仁道政治的核心内容,丰富了儒家“生生”发展观的内涵。这样一种发展观蕴含着对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个人修身为基点,学以成人,建立理想的道德(君子)人格。要求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精神水准,以社会

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公为己任,承担起对自然、社会、家庭的责任。

第三,弘扬“参赞化育”的社会实践精神。儒家思想非常强调要体会“天地生物之心”,倡导发扬天道赋予人的生命精神,积极参与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人是宇宙万物的组成部分,人性来自天性,人类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与天地合其德”,在使人类的一切思想行为符合宇宙“生生”目的和宇宙演化自然规律的同时,保证实现人类生存、发展这一根本目的。

第四,秉持“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其它宗教信仰追求超现实的彼岸世界相比,中华文明更注重对时间和现实的把握,相信人可以在现实的世界中建成理想的世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人的价值。儒家思想中对时间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事物的变化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面对着时间永无止境的变化,积极奉行“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精神;在“随时之义大也哉”的认识中,产生了“时中”的思想方法论,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安排在现实的时间中展开;对时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形成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时中务实的具有创新性的文化特质。

中华思想文化中以“生生”为本的人类生存发展理念,直接关注的就是人类的整体前途命运。“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万物并育”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以为人类应对困难和危机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经过现代诠释和与其他文明的互鉴,能够形成对人类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如何避免地球环境恶化导致人类的不可生存?如何避免不使人类在核战争中毁于一旦?如何使人类在和平和谐的环境中生存繁衍?这是当代人类生存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都应该服从这个大局,服从人类“生生”之大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就是关乎人类命运的精神取向,而以“生生”为本的人类生存发展观应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

四、“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理想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思想,记录在《尚书》《周礼》等古代经典之中。经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传承奠基及后代的践行、阐发,形成了以德治为主,重视民生,制礼作乐,教化人民的治国理政传统和建设大同社会的理想,反映了人类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基本规律和崇高的价值理想,昭示了中国人治国、济世的人文情怀和政治文化理想。

第一,“正德、利用、厚生”的治国理政总原则。从中国远古的文化传统中有一治国济世的政治理想,就是《左传》中记载的要求当时的帝王要遵循的“正德、利用、厚生”理念。这是中国古代积累的政治智慧,几千年来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中国文化中经邦济民的基本原则。“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也]。”^{[16](P56)}“正德”是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修养、品格、思想的道德要求,领导者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作为榜样,同时要理解人民的重要性,要有牺牲奉献的服务精神;“利用”就是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生活各方面都需求;“厚生”按孔子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也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而安身立命。“正德、利用、厚生”是中国经过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政治思想,从古至今发展成为治国、治世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适的价值。事实上,中国的往圣先贤亦把它设定为一切政治、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旨归的儒家学说也是以此为目的进行建构的。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格言,体现的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

第二,“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正

德、利用、厚生”的理念的核心就是“民为邦本”的思想，一切政治活动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为总则，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来源在中国文化典籍《尚书》《左传》《孟子》中都有记载。《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中国古人认为天有意志和知觉，天的视听通过老百姓的视听来体现，君主要按照老百姓的意志来办事，国家设立官僚机构、官吏以为百姓谋福利为主要任务，这是中国民本主义的来源。

第三，“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认为可以在现实的人世间建设成一个美好的世界。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特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7](P298)}这里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由圣贤领导下的天下为公、各尽所能、安全稳定、充满和谐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世界，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其原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曾有各种进步的力量和社会思潮都从中汲取力量，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家都曾据此擘画中国的发展蓝图。习近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制订的“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进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构想，亦是其必然的思想逻辑。

大同理想的形成与传承、弘扬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晶。为儒家提出的“生生”发展观建立了远大目标，是对儒家“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理想，民本主义思想，仁政、王道、王制、内圣外王的治国、治世理念，孔子的忠恕，老子的慈惠，墨子的兼爱思想的总结，积淀着中华民族深沉的追求。大同理想中积极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倡导每个人不

能只为自己生活，要同情体贴他人，博爱人类，在建设自己理想国家的基础上，再推而广之，与世界人民一道，通过合作奋斗，建设“美美与共”的全人类的美好世界。“正德、利用、厚生”的治国、治世原则，“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人文情怀和政治理想及向往公正、和平社会的美好追求。这些文化理想的产生虽然有其民族性，但它倡导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总精神，具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意义。为全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蓝图，经过转化可以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精神力量。

五、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

人类生活在各类群体之中，如何与他人、他族、他国进行交往，一直以来是人类生存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中有一套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备的理论，并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几千年的实践，这就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18](P43)}。它构成了中华民族、中国人为人处世，开展国际交往的基本遵循和文明交流互鉴观。“忠恕之道”是建立在德道基础上的交往原则，是儒家“仁”的核心价值在人际、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这种对待他者的理论和实践经过历代的先贤，政治家结合时代的实际创新发展，不断升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认识。

第一个层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具有公约性质的待人之道。在世界许多文明中都有类似的表述，但以孔子的表述最为明确。这是“忠恕之道”中恕道的体现。“恕”是一种将心比心，宽以待人的精神，其内含的深层意思就是要推己及人，克服自私心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为他人着想。待人待事不只讲一人利益、一国利益，而是要讲全人类利益，人与

自然利益,这种思想倡导每个国家、民族在安排自己的生活计划时不能只顾私利,要善体“中”(忠)道,使所有私利都能顾全大局;善体“恕”道,真正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为最大多数着想,然后才能产生共同互惠的普遍利益。现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跨越地域和人种被世界人民广泛认同,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定律。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宣言》、1946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世界伦理宣言》、由各国前政要组成的国际行动理事会于1997发布的政府首脑《人类责任宣言》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作为国际关系的金律载入其中,对世界的和平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个层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积极有为境界。通俗地讲就是我好也希望别人也好。这是“忠恕之道”中“忠”的应用,即待人的积极进取态度。《论语》记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中说“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中庸说“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忠”的表层意思指全心全意为人着想,其深层意思内含着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就是这种文化精神,它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思想来源。

第三个层面即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9](P334)}就是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尊重欣赏其他的文明,这样世界的上的不同文明就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

第四个层面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强调的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文明倡议中提出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

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交流和人文合作。这是根据当代国际社会实际对“忠恕之道”理论、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创新,使学术理论上升到政治、治国理政层面,形成了具有中华文明特征的文明交流互鉴观。既包括了对待本民族文化、其他民族文化的态度,也包括了实现不同文明融合、相处的方法、路径。把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创新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到了新的高度。

国际关系是当代人类交往最主要的途径,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世界的文明体系中还没有任何文明像中华文明中这样具有系统化、理论化处理人际关系的理论,它当然地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要害。

六、结语:跨文明的“相聚点”

学者赵汀阳指出:“固化的文化传统是拒绝跨主体性的单维度思想空间,因此需要开拓一个足够容纳多种文明的高维度思想空间,使之大于并包含所有知识体系,使得本来在低维度不相通的思想能够在更高维度中相会”。他认为在缺乏文化默契的条件下去发现隐藏着的“相聚点”是比较困难的,但以普遍问题或共同问题作为思想的重新出发点去寻找是一条思路。那些人人无法回避的普遍问题或共同问题毫无疑问一定是共同的出发点和“相聚点”。赵汀阳还根据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原则,提出“孔子改善”作为文明共同升级、互惠发展的不同文明“相聚点”的可能性。^[20]这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厚中华文明底蕴,为我们探寻全球治理逻辑,找到跨文明“相聚点”提供依据。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如何才能和平友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底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解决方案。它以世界问题导向为出发点,

兼顾了不同国家、民族、人民的整体利益,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成为跨文明的“相聚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也是世界各种不同文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流、互鉴、融合过程,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The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 Confucian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M]. 北京:中译出版社,2019.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牟钟鉴.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4]庄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 [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1-8.
- [6]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7]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93-96.
- [8]四书五经·周易[M].北京: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
- [9]王阳明.大学问[M]//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22.
- [11]泰戈尔.人生的亲证[M].宫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2]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
- [13]左丘明.国语[M].罗家湘,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1.
- [14]四书五经·中庸[M].北京: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
- [15]方东美.方东美全集·生生之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 [16]魏征,等.群书治要考译:第一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 [17]王文锦.礼记注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8]钱逊.论语·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读本[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6.
- [19]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0]赵汀阳.跨文明与跨主体性的可能条件[J].船山学刊:2023(4):1-9.

【责任编辑 刘红娟 邱佛梅】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al Basi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IU Xipi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t points the way for the world to build a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It has a deep Chinese civilizational basis: The cosmological view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s its deep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The concept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ceaseless vitality” provides endless spiritual power for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humanistic feelings and political ideals of “cosmopolitanism”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order; The “way of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with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reflects the mutual learning concep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akes global issu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considers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diverse countries, nations, and peoples, strives for the val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humanity, and serves as a cross-civilizational “convergence point”.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changes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